

雪域高原上的福音傳播

天主教在藏區福傳概要

羽田月¹

本文首先介紹西藏的地理環境與歷史上大藏區的行政範圍。進而分由三個歷史階段，介紹傳教士進入西藏福傳的歷程：十七世紀以耶穌會士為代表、十八世紀（1707~1745）方濟各加布遣會神父的傳教策略，及 1846 年教廷將藏區傳教事務委託在四川地區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在這三世紀來勇往西藏傳教，有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也有人對西藏做了精細研究並留下寶貴著作，他們對東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也在西藏傳教史的耕耘中埋下了福音種子，值得後人肯定與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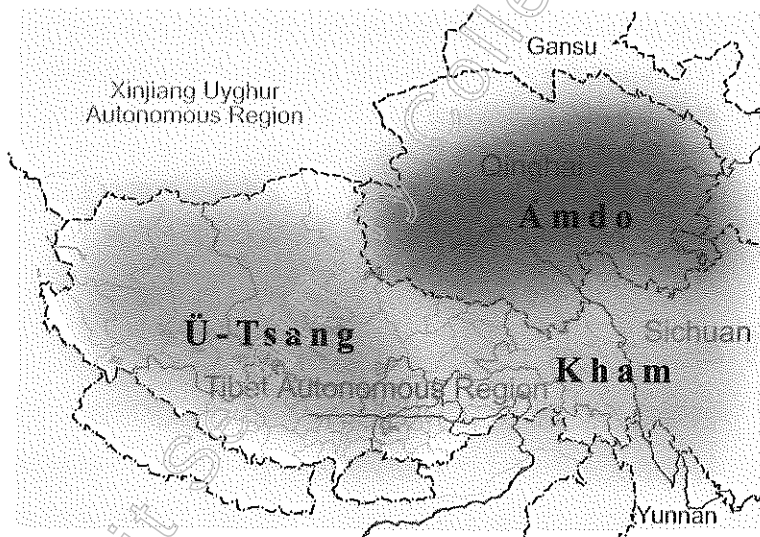
前言

西藏給予世人的直接印象是雪域高原、悠久的佛教文化歷史、拉薩的大小寺廟林立，卻少有人知道，在這一片雪域佛國之內，也曾經有過為數眾多的傳教士，拋灑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在雪域高原之上，為基督傳播福音。今日在西藏的偏遠地區仍然有一些教堂的存在，包括雲南的鹽井天主堂，就是昔日傳教士辛勤耕耘播種所結下的果實。

¹ 本文作者：羽田月，出生於中國，現旅居海外的華人，從事中國教會史講授與研究工作，具有多年教學經歷。

在介紹西藏福音傳播史之前，首先介紹一下西藏的地理環境。今日慣常提到的西藏，在當今中國版圖中，是僅次於新疆的第二大行政區域。但是嚴格意義上來講，天主教在藏區的傳播範圍，遠遠大於今天西藏自治区的行政劃分。歷史上的西藏，即所謂大藏區的概念，大致包含衛藏地區（Ü-Tsang）、康區（Kham）、安多（Amdo）三個區域。

【大藏區地理分布圖】²



所謂的衛藏（Ü-Tsang），即衛和藏兩個地區的一個合稱：清朝史書中稱衛為前藏，以今天的拉薩為中心，涵蓋拉薩、山南、林芝地區；後藏相當於今天日喀則為中心的地區；兩地合稱衛

² 本圖取自：File:Tibet provinces.png - Wikimed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ibet_provinces.png

藏，即今日西藏自治區行政範圍。清雍正年間，朝廷曾經試圖把衛藏分離，分別交由達賴及班禪治理，但是最終計畫破滅。乾隆年間，七世達賴配合清軍平定西藏地方郡王叛亂³。乾隆16年（1751）清廷頒布《西藏善後章程》，確立達賴喇嘛的政治地位，作為西藏地區的政教領袖，會同駐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務；班禪駐錫地在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班禪雖然在藏傳佛教中被視為無量壽佛（阿彌陀佛）的化身，地位崇高，但是在西藏的政治權力中則居於達賴之下。

康區（Khan）包括今日四川省西南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以及西藏和四川接壤的昌都地區：民國28年（1939）國民政府設立為西康省，省會是康定。天主教在康區傳播以打箭爐（康定）為中心，逐漸形成打箭爐代牧區，1946年正式成為康定教區，是天主教會在藏區最後的一個傳教中心。傳教活動從西藏的核心地帶逐漸向邊緣地區轉移，康定教區曾經是十九世紀規模最為龐大的一個傳教區，是當時教會為了準備日後重返西藏傳教的一個前驅站，因為此地區在歷史上也屬於大藏區的一部分。

安多（Amdo）範圍包括今天的青海南部的五個藏族自治州，除玉樹之外，包括黃南、果洛、海西、海北、海南。甘肅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的阿壩藏族自治州，史稱為安多地區。

綜上所述，歷史上大藏區的範圍，涵蓋了衛藏、安多、康

³ 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割勒，於清乾隆15年（1750）舉兵反清，清廷派四川總督圍剿，平定西藏之亂。

區。按照今日中國行政區分，大藏區包含了如今的西藏自治區、青海省一大部分、甘肅省的一部分、四川省的西南部、雲南省和藏區接壤的地方，面積廣闊。

傳教士進入西藏，大致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七世紀以耶穌會士為代表，他們以印度的果阿為基地，跨越喜馬拉雅山，進入西藏古格王朝統治地區傳教⁴；第二階段以十八世紀初（1707）方濟各加布遣會的神父進入西藏傳教，大致時間從1707年入藏到1745年撤出拉薩；第三階段為鴉片戰爭之後，1846年教廷將藏區傳教事務委託在四川地區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這一時期主要以康區活動為主。

一、耶穌會時期

耶穌會士早在十六世紀初就隨葡萄牙人抵達印度，1533年教廷設立果阿（Goa）主教區，1558年升格為總主教區，負責管轄印度和遠東地區的傳教事務。耶穌會在印度傳教時期，曾經有部分耶穌會士在莫臥兒帝國⁵ 宮廷中為皇帝服務，希望上層人士的皈依，來推動民衆對天主教的接受。莫臥兒帝國阿克巴

⁴ 古格王朝是吐蕃王朝瓦解後，十世紀末興起的西藏王國，統治區域位於今日西藏阿里地區以及印度北部地方，1635年被拉達克王朝所滅。

⁵ 莫臥兒帝國（1526~1857）由蒙古察合台汗國後裔巴布林在印度建立的王朝，統治者信奉伊斯蘭教，統治著印度不同種族信仰，帝國全盛時期，統治範圍涵蓋了南亞次大陸及阿富汗等地區。1857年末代皇帝被英國殖民者所廢黜，帝國滅亡。

皇帝（1556~1605）在位時期，爲了消弭國內不同種族宗教間的紛爭，實行宗教寬容的政策，對不同宗教採取開放的態度，這使耶穌會士認爲：如果能夠勸化國王，可以事半功倍地推動在印度的傳教工作。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會士們發現阿克巴皇帝骨子裡依然是虔誠的穆斯林，難以勸化。在宮廷中，耶穌會士接觸到了不同國家的使節，透過彼此的交流，他們得到了對於西藏最初的認識。

在印度的耶穌會士中，他們聽說了一個關於西藏的古老傳說：自十五世紀以來，喜馬拉雅山脈中有一個隱秘的基督徒部落；是景教徒的後裔，也可能是其他教派，並沒有定論。耶穌會在莫臥兒帝國的宮廷中，曾經採訪了印度教的一些苦行僧，他們曾經跨越喜馬拉雅，到藏地去進行活動；耶穌會士儘量地收集他們帶回來的資料，然後進行整理。但是這些資料中，有很多華而不實的成分，有些記載完全脫離了歷史，看起來荒誕不經。會士們經過長期的研究，得出了幾點結論：

- （一）派遣會士前往西藏該區，去證實當地是否真有一個基督徒部落，查明此部落是否爲景教徒的後裔，或是其他東方禮的教會；
- （二）如果真的發現這個部落，會士們可以向他們宣講，使他們重新回到羅馬教會的懷抱；
- （三）如果沒有所謂的基督徒部落，當地都是異教徒，則對會士們而言，是又開闢了一個傳教戰場。

會士們從以上角度考察派遣傳教士到當地，屬於非常合理的決策。如果入藏成功，在當地建立傳教中心，即可沿西藏找尋通往中國內地的新路徑，從而避開海路遭遇荷蘭軍艦的攔截騷擾。新傳教路線的開闢，將會帶來新的契機，而將沿途的諸國歸於傳教區域範圍之內。

在此考量下，耶穌會士們首先到達了古格王朝領地。古格王朝所在的阿里地區，是上路弘法⁶的中心地帶，佛教勢力十分強大，可以預見耶穌會士在當地傳教面臨著巨大的挑戰。1624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安多德（Antonio de Andrade，1581~1634）和其他兩名會士前往西藏，穿越喜馬拉雅山，到達了古格王朝的首府扎布讓（今天西藏札達縣）。

耶穌會士的到來，得到了古格王朝君主赤扎西查巴德王的歡迎。耶穌會士能夠很快站穩腳跟，與當時古格王朝的政治形勢緊密相連。古格王朝君主赤扎西查巴德與當時西藏佛教喇嘛集團發生劇烈衝突，藏傳佛教格魯派⁷（黃教）在當地勢力雄厚。

⁶ 主曆 838 年，吐蕃贊普朗達瑪發起了一系列的滅佛運動，使佛教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寺廟被摧毀，強迫僧侶還俗，佛教在西藏一度沉寂，一直到了第十世紀西藏佛教才逐漸復興。達瑪滅佛之前的佛教，稱為前弘期；十世紀以後佛教復興，史稱之為佛教在西藏的後弘期。後弘期的佛教有兩條復興路線，史稱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下路弘法是以安多地區為中心，佛教僧侶開始回流到西藏傳教。上路弘法是以古格王朝所在的阿里地區為中心，從印度迎請高僧阿底峽等人重新返回西藏傳教。

⁷ 藏傳佛教中四大教派之一，創始人宗喀巴（1357~1419）在噶當派教義基礎上，融合其他宗派形成格魯派；改派重戒律，主張顯密

查巴德王的弟弟是格魯派的一位著名法王，兄弟失和的背後則是古格國王爲代表的世俗力量，與黃教喇嘛爲代表的宗教勢力的政治角逐。古格王希望削弱格魯派的影響力，頒布一些限制措施，如要求部分僧侶還俗、承擔賦稅勞役；他的舉措已經激起了格魯派僧侶的不滿。古格王覺得耶穌會士的到來，是一重要的助力，他認爲這股新的力量背後並不尋常，可以借用耶穌會的力量來壓制盛極一時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影響。古格王對安多德及其他耶穌會士予以極其隆重的接待和禮遇，特別准許他們在王國範圍內展開傳教活動，賜予土地、饋贈房屋支援他們傳教，並提供傳教經費，也率領王室成員出席耶穌會主辦的一些活動。

1626年8月，古格王朝的首都扎不讓建立了西藏歷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以這座教堂爲中心，開始展開了在西藏傳教活動，國王、王子、王太后都參加了耶穌會士舉辦的布道活動。神父們編纂發行傳教小冊子，比較天主教和藏傳佛教的區別，書中對佛教一些宗教儀式及教義，如靈魂轉世、輪迴的觀念，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並對藏傳佛教的一些理念加以抨擊。這博得了古格王的好感，但也引起藏傳佛教喇嘛們的強烈反感，埋下了日後教會被驅逐的命運。

教堂興建後，很多人開始絡繹不絕參觀教堂。會士們將一些聖物或十字架饋贈給這些訪客。古格國王也將十字架佩戴於

兼修。1409年宗喀巴在拉薩建立甘丹寺，收徒教學，弟子衆多，後世達賴、班禪均屬格魯派宗教領袖。

胸前，還表示自己出征時也要常佩戴。耶穌會士們將君士坦丁大帝靠著十字架庇佑而戰勝了敵人的這個故事向古格王進行了宣講，古格王相當感興趣，認為十字架的確具有神秘力量，加深了對教會的好感。安多德神父向印度省會報告時講到：「我們在此地獲取了傳教的自由，耶穌基督的聖名不僅家喻戶曉，而且還受到人們的頂禮膜拜，聖像在當地廣受歡迎。當地人非常虔誠和高興地佩戴了我們的十字架」⁸。

傳教士在古格王室的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耶穌會也計畫派遣更多會士前往阿里地區進行傳教，希望能在當地形成一個更大的傳教中心，並期盼隨著古格王朝的皈依，在西藏形成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王國。

古格王朝所在之地的阿里地區，僧侶眾多，佛教的文化根深蒂固。耶穌會到來之後，雖然得到了古格王室的贊助，但總體上來講，對底層民衆的影響力遠不及藏傳佛教。這是一個先天的缺陷，耶穌會在當地傳教時，也感覺到除了王室成員之外，平民皈依者人數不多。會士們也反省，可能當地的民衆對於信仰理解不深，自己的傳教努力不夠。按照耶穌會史料記載，1624~1627 三年期間裡，平民中只有 10 人領洗入教，這個數字和他們的預期相距甚遠。在其他地區，人數更少，整個古格王

⁸ “Lettera del p Antonio de Andrade al Generale della compagnia di Rona, 15 Agosto 1626”。轉引自伍昆明，《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北京：中國藏學，1992），162 頁。

國之內，受洗的基督徒還不到 400 人⁹，而且這 400 人中，除了王室成員之外，絕大多數是一些為國王服務的奴僕。安多德神父認為，當地人不瞭解我們的信仰，他們的宗教情感淡薄。

雖然困難重重，但安多德神父傳教事業充滿了信心。他始終認為古格王朝傳教事業將會日漸興盛，眼前的挫折是短暫的，未來當地的民衆受國王的感召，將會逐漸接受信仰，只是需要時間。然而，隨著時間的推演，證實了耶穌會的論點不夠客觀。自 1627 年開始，國王發起了一場針對藏傳佛教的打擊運動。類似當年的達瑪滅佛一樣，強迫部分僧侶還俗，即使出家的僧侶也要服兵役；底層的民衆和一些喇嘛認為，這是耶穌會士從旁慫恿，使得國王發起了反佛教的運動。民衆也把古格王查巴德視為第二個達瑪，而耶穌會在這場政教鬥爭中充當了犧牲品。

1630 年古格國王患病，安多德神父也返回印度，出任印度耶穌會果阿省會的省會長。利用國王重病機會，藏傳佛教的僧侶們發起了武裝暴動，數千名的喇嘛及民衆包圍王宮，將古格王俘虜並投入監獄之中，赤扎西查巴德王統治被推翻。新上臺的君主立刻採取針對耶穌會的打擊和限制政策，重新恢復佛教作為國教，教堂被焚毀，有的傳教士被殺，有的則冒險逃回了印度，向當時已經是省會長的安多德神父進行了詳細的彙報，而在暴亂之中，對於傳教士的種種暴行駭人聽聞。

⁹ 同上，165 頁。

聽聞古格王朝暴動消息的安多德神父，雖然此時已經是省會長了，但聽聞王朝內部發生了動亂，憂心如焚，他決心要返回古格王國，重建教會；遺憾的是，他壯志未酬，1634年死於一場陰謀毒殺事件。安多德去世之後，耶穌會重整旗鼓，他們認為新政權是受了藏傳佛教僧侶的迷惑，對於天主教信仰並不瞭解，他們願意派人去進行解釋。1635年組建了一個七位會士傳教小組再次前往古格王朝，但七人中最終活著抵達首都拉達讓時候，只剩下三人，其餘四人都在途中去世。當剩餘三人抵達當地時，發現形勢已經發生了改變，新建立的政權深受藏傳佛教的影響，對傳教士抱持敵對態度；當年要求接受洗禮的本地基督徒，要麼重新歸於佛教，要不就被驅逐出境。昔日在古格王朝建立的教堂和傳教中心全部關閉，房產沒收，有的教堂被摧毀之後重新捐獻給佛教，改變成寺廟。

耶穌會士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1640年又開始在日喀則展開新的傳教活動。日喀則地區和蒙古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明末清初蒙古的部落南下，征服了西藏，蒙古來的這些統治者在明末清初統治著日喀則地區；當地的統治者藏巴汗雖然對傳教士態度溫和，是基於經商的需要，以便與葡萄牙的商人往來。在日喀則地區傳教的兩名會士——卡塞拉神父和卡布拉爾兩位神父——錯誤地領會了藏巴汗的善意，寬容政策並不代表他對基督信仰有多大的興趣，真正在意的是通商帶來的經濟利益。

當傳教士正式在日喀則地區開展傳教的時候，立刻就遭到了當地黃教喇嘛強烈的反對。他們勸告藏巴汗勿要接受外人挑

唆，並且以古格王朝的覆滅作為前車之鑒來警告藏巴汗，不要寬容這些傳教士。受藏傳佛教僧侶的威脅，藏巴汗最終下令驅逐傳教士。卡塞拉神父（Estêvão Cacella）和卡布拉爾（João Cabral）兩位神父的事業剛剛起步，就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兩位會士最終被驅逐出境，返回了印度。耶穌會在日喀則地區的活動再次失敗，耶穌會西藏傳教活動至此告一段落。

二、方濟各加布遣會時期

1704 年教廷傳信部派遣方濟各加布遣會神父（Ordo Fratrum Minorum Capuccinorum，OFM Cap）赴藏傳教。首批共六位，包括 2 位法國神父、4 位義大利神父。方濟各加布遣會神父經吸取耶穌會失敗的教訓後，沒有一開始就從事傳教事業，而是首先開設醫院，用治病的方式在拉薩站穩腳跟，並在自己的住所興建了一座小教堂，每天過著嚴謹的生活，用身教方式吸引周邊群眾。逐漸地，開始有周邊人詢問你們的信仰是什麼？為什麼和我不一樣？古瑟譜（Giuseppe da Ascoli）和弗朗索瓦（Francois Marie de Tours）兩位神父以禮儀生活來吸引藏人。在較短的時間內，他們在拉薩形成了一個小型的基督徒團體，這個團體成立之後，沒有受到拉薩地方政府的干預，他們遂開始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傳教範圍。

隨著傳教規模的擴大，挑戰也隨即到來，會士們經常被經費問題所困擾。在當地經營的醫院又屬於義診的方式，難有穩定的收入，使得傳教活動經常陷於困頓。經濟困境是嚴重的問

題，加布遣會神父們在給教廷傳信部的報告中，反覆強調追加傳教經費的問題。以治病為始，向西藏人傳教，在拉藏汗的宮廷之中站穩了腳跟。王室侍從中，開始有人接受了信仰；遺憾的是，加布遣會在西藏辛勤耕耘的時候，也恰是西藏政局動盪的時期。康熙 27 年（1688）開始的平定大業（準噶爾之役）¹⁰，漠西蒙古準噶爾部盤踞青海，新疆南部地區之後開始南下侵擾西藏。

1717 年準噶爾部南下進攻西藏，在攻佔拉薩之後，在當地大肆劫掠，傳教士們辛苦建立的傳教站和教堂毀於一旦。傳教士們已經無法展開工作，被迫返回印度。1720 年清朝驅逐準噶爾軍之後，傳教士們才又返回拉薩，重新開展傳教工作。雖然戰前傳教事業已經小有規模，當地的教會已經具有了基礎；但由於戰火的影響，信徒或是被殺，或是流落四方，或者重新皈依佛教，教會團體事實上已經處於解體的狀態。除卻戰火的摧殘，戰後傳教工作的困難還在於西藏政治局勢的轉變，平定準噶爾部之後，清廷裁撤藏王制度，支持七世達賴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體制。達賴喇嘛既是宗教領袖，又是政治領袖，清廷任命駐藏大臣會同達賴治理藏地事物，組建噶廈即西藏的地方政府，由四位俗人、兩位僧侶組成的執政集團作為日常的辦公機構，這項制度一直延續到 1959 年才被正式廢除。

¹⁰ 準噶爾之役始於清康熙 27 年（1688），終於清乾隆 23 年（1758），是清廷與漠西蒙古準噶爾部的戰爭，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後共七十年，平定準噶爾部後，清廷掌控天山南北兩路。

政教合一體制的確立，為西藏的傳教事業帶來了嚴重挑戰。達賴在過去只是宗教領袖，雖然他對教會傳教士有所不滿，但不能直接出手干預。隨著政教合一體制的確立，達賴集政教大權於一身，當地民衆對於西方，尤其針對傳教士敵視的態度更加濃厚，在政教合一體制下，藏傳佛教被視為國教一般存在。西藏政府開始限制傳教士的活動，鼓動民間掀起聲勢浩大的反教運動。1725 年拉薩洪水氾濫，噶廈利用這個機會掀起了一場損毀教堂、驅逐傳教士的運動，他們鼓吹正是因傳教士在此才帶來這場天災，傳教士成了無辜的替罪羔羊。藏傳佛教的僧侶們及一些激進的信徒，對傳教士及其教堂、傳教中心展開了大規模的攻擊，傳教士住所日夜都有人監視，夜間還有人投擲石子，傳教活動備受壓力。一些傳教士也被扣上破壞寺廟的罪名，其實傳教士並未破壞當地寺廟，只是發行傳教書籍引起佛教僧侶的反感。遭逮捕之後，他們接受了嚴厲的拷打，並對入教的藏人信徒一律貶為奴隸。

在如此嚴峻情形之下，傳教士基本上只能被困於拉薩小教堂之內，難以外出傳教。直到 1745 年，西藏地方政府下達徹底的驅逐令，要求傳教士在限定期間內必須離開西藏。1745 年 4 月，加布遣會在西藏活躍了將近 40 年之後，最終離開了西藏。

三、巴黎外方傳教會時期

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之後，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國門開始打開。1846 年法國遣使會古伯察神父（Évariste Régis

Huc, 1813~1860) 與秦噶哩神父 (Joseph Gabet, 1808~1853) 以探險的名義重新入藏, 既是探路、也是試圖重新打開西藏的傳教局面。兩人抵達拉薩後, 與西藏地方官員接觸, 最終被清廷駐藏大臣綺善逮捕驅逐。古伯察後來完成《韃靼西藏旅行記》, 介紹沿途風景、地理民族風俗, 在歐洲流行一時。1846 年教廷授權在四川工作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展開對西藏的傳教工作; 同年教廷設立拉薩代牧區, 由四川宗座代牧兼任拉薩代牧。遺憾的是, 清政府再三強調, 條約開放僅限於五口通商 (廣州、廈門、寧波、福州、上海) 之地, 縱使傳教士可入內地自由傳教, 西藏不屬中國內地, 嚴禁傳教士進入。

除清廷阻撓傳教士入藏外, 西藏本地僧俗亦對傳教士抱持敵對態度。1879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八世班禪喇嘛聯名向清廷呈交「全藏公稟永遠不准洋人入境」的請願書, 聲稱代表西藏僧俗民衆, 堅決反對洋人入藏, 請願書聲稱¹¹:

掌辦商上事務通善濟隴呼圖克圖恭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率領閩藏眾呼圖克圖三大寺堪布新舊佛公、台吉、僧俗番官軍民人等公具切實甘結, 懇請欽差駐藏辦事大臣松代為奏諮事。伏查洋人入藏遊歷一案, 屢接駐藏大臣譯文內稱, 立定條約, 准其入藏, 奏明之件, 萬無更改。各國到時, 漢番一體照護, 勿滋事端等因。並面奉屢次訓

¹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奏摺》, 民族類, 1046 卷, 2 號文件; 轉引自王力雄,《天葬: 西藏的命運》(香港: 明鏡, 1998), 32 頁。

切曉諭，遂將藏中向無洋人來過，並習教不同，恐於佛地有礙。聞藏僧俗大眾公立誓詞，斷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結，實在情形，大眾苦衷，懇求駐藏大臣代為諮報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興黃教，保護佛地，何能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豈敢執意抗違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實非善良之輩，侮滅佛教，欺哄愚人，實為冰炭，斷難相處。茲據聞藏僧俗共立誓詞，不准放入，出具切結。從此世世不顧生死，永遠不准入境。如有來者，各路派兵阻擋，善言勸阻，相安無事。如或逞強，即以唐古忒之眾，拼命相敵。諒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護黃教，斷不致被其欺壓而遭不幸也。謹將聞藏僧俗官民大眾公議苦衷傷心情形，出具切實甘結，特求駐藏大臣代為奏諮，切望皇恩無疆以救聞藏眾生之性命也，謹呈。

由此激烈的請願書可見，西藏內部對於洋人尤其是傳教士的仇視與排斥。內外形勢的逼迫，迫使巴黎外方傳教會被迫放棄進入拉薩及西藏腹地傳教的計畫，轉而向康區發展，意圖勸化當地藏人皈依天主教。1865年教廷任命巴黎外方傳教會丁盛榮神父（Chauveau Desgodins, 1816~1877）為西藏代牧區宗座代牧，他將主教駐地建立在打箭爐（康定），從此打箭爐成為天主教在康區傳播的中心。傳教士們雖然在藏區邊緣建立教堂，心中卻始終希望終有一日能夠抵達拉薩進行福傳；十九世紀中期到廿世紀初這段時期，傳教士們在衛藏傳教失敗，成為他們心中永遠的傷痛。

結語

進入廿世紀，教廷對西藏傳教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 1910 年取消西藏代牧區，改設打箭爐（康定）代牧區，下轄康定、瀘定、爐霍、丹巴、道孚、巴安、鹽井、漢源、懋功、靖化和雲南維西、德欽、貢山 13 縣。天主教在康區設立學校、診所及醫院，服務社會大眾。1920~1930 年代，在巴黎外方傳教會邀請下，瑪利亞方濟各會修女、瑞士的聖伯爾納鐸會司鐸及修士先後來到康區，在雲南藏區（維西、茨中等地）建立教堂，服務信眾。1946 年聖統制確立後，康定教區有：「教堂 19 座，分堂（祈禱所）16 座，信徒 5361 人，外籍司鐸 23 人，國籍司鐸 6 人，外籍修士 3 人，國籍修士 3 人。辦有中學 1 所、職業學校 1 所、護士學校 1 所、醫院 1 所、診所 1 所、孤兒院 2 所，養老院 1 所。」¹²

歷經百餘年，從十七至廿世紀這 300 多年間，耶穌會、方濟各加布遣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等為數眾多的會士前赴後繼，前往西藏傳教。很多傳教士付出了生命代價，在入藏傳教的同時，不同修會的傳教士們也對西藏的歷史、宗教、民俗風情進行了細緻研究，留下了眾多寶貴的著作，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耶穌會士德西德理神父（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是著名的藏語專家，他將其在西藏的觀察研究記錄成書，出版了《西藏紀事》，介紹了西藏基本概要；他對藏傳佛教的研究，

¹² 《康定縣誌》（四川：四川辭書，1995），452~453 頁。

尤為深入，包括藏傳佛教的教派、儀軌、經文都有深入研究，被後世西方學者譽為西方藏學的先驅人物之一。

方濟各加布遣會的奧拉齊奧神父（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1680~1745），將佛教《佛本生經》、《波羅提木叉經》¹³翻譯為拉丁文；弗拉索瓦神父亦編纂了《拉藏詞典》，帶動了歐洲學術界對西藏研究的熱情；在《拉藏詞典》基礎上，奧拉齊奧神父又出版了《意藏詞典》。不同修會傳教士向其修會長上所寫的報告中，包含了對西藏地理、民族、風俗的介紹，以他們特有的觀察，向西方世界掀開了雪域高原的神秘面紗，使西方世界開始認識西藏。為瞭解西藏，這批傳教士們功不可沒。

西藏傳教史的艱辛曲折，其中有政治因素，也有宗教文化的衝突，及自然環境的影響；西藏政治局勢的變換，更對傳教事業帶來挫折和打擊。雖然傳教的果實並不豐碩，甚至有些苦澀，但傳教士的辛勤耕耘，仍然使福音的種子在藏地中結出了些許果實，它們是為數眾多傳教士用鮮血澆灌的一個成果，值得後人肯定與借鑒。

¹³ 《波羅提木叉經》中的波羅提木叉為梵文音譯，意為解脫之意，是佛教中關於戒律的重要經文。